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3.02.013

财政视角下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比较研究^{*}

刘济勇,张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财政税务学院,武汉 430073)

摘要:洋务运动前的中国和明治维新前的日本财政状况相似,都遇到了财政危机。由于两国在变革前政治、经济的差异以及两国改革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的不同,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并未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财政体制也仍然是封建制度下的管理方式,只是把中央政府的财权下移,最终没有带来财政状况的改善,反而加剧了财政危机;而日本政府的明治维新改革是全方位的,进行了相对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俸禄制度以减少财政支出,改革地税以增加财政收入,扶持民间资本以开拓新税源,最终化解了财政危机,并建立了新的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财政体制。

关键词:洋务运动;明治维新;近代化;社会变革;政治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财政收支状况;财政危机;民间资本;民用企业

中图分类号:F811.6;F06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2-0095-07

一、引言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秉承传统东方文化。19世纪初,两国都经历了“农民起义、官僚腐化”的内患和“列强侵略、屈辱签约”的外患。在相似的国内外环境下,两国都以救亡图存为目的,分别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开端,几乎同时走上了近代化的探索之路。但甲午战争的结果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和明治维新的成功。

对于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维新变法“同途殊归”的深层次原因,国内外学者已经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层面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与探讨。本文试图以财政政策作为切入点,通过分析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后中、日两国的财政状况及

其变化,并比较变革前后两国财政体制的不同变化,以窥这两场惊心动魄的社会变革对中、日两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与影响,进而为我国转型时期的财税体制改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洋务运动前后清朝的财政体制和财政收支状况

1. 洋务运动前清朝的财政收支状况

洋务运动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在经历“好大喜功、不断征讨”的乾隆和“天理教作乱、白莲教起义”的嘉庆之后,清朝财政就像一个用力过度的发条,将康、雍、乾鼎盛时期“摊丁入户”所积累的国库盈余消耗殆尽,到“四面楚歌”的道光年间已

* 收稿日期:2013-02-02;修回日期:2013-03-01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计划(2012B0302)

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湖北地方税收研究中心课题基金资助项目(sszx201204)

作者简介:刘济勇(1973—),男,湖北宜昌人;博士研究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学习,主要从事公共政策与财税理论研究。

张楠(1989—)男,重庆巴南人;硕士研究生,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学习,主要从事财税理论研究。

明显地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状况。而在洋务运动开始前,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以及连年不断、此起彼伏的天灾人祸,也对这个病入膏肓的封建农业国家带来沉重打击,严重地侵蚀着国家财政。

(1) 政收入减少

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得西方列强开始走向资本主义工业化,而此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依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阶段。在康、雍、乾时代“滋生人丁、永不征税”的赋役制度下,清朝初期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社会稳定,人口迅速增长,从顺治八年(1651年)的42.53百万人增加到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的434.39百万人。虽然人口增长较快,但耕地面积却并没有同比例增加,顺治八年(1651年)的耕地面积为268.06百万亩,到道光三十一年(1851年)为697百万亩;人口增加了921%,耕地面积只增加了160%(见表1)。由于并没有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加上乾、嘉时期开始的土地兼并政策使许多有自耕土地的农民沦为佃农,农业生产的边际收益下降。粮食产量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已捉襟见肘,农民还要面对固定赋税的压力,生存已成为农民头等大事。由于封建社会中大地主一般是官僚集团的成员,他们还通过种种手段寻租,偷逃税款,将沉重的税负转嫁到农民头上。伴随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所引发的对地区管辖权的丧失,清政府的最大宗税源——田赋征收困难,田赋收入锐减(萧一山,2006)。

表1 清朝人口与耕地数据

时间	人口/百万	耕地/百万亩	人均耕地/亩
1651年	42.53	268.06	6.30
1661年	76.55	485.22	6.34
1685年	81.37	560.19	6.88
1706年	81.65	551.95	6.76
1722年	103.05	784.37	7.61
1753年	183.68	677.58	3.69
1784年	286.33	700.94	2.45
1812年	333.70	727.08	2.18
1822年	372.46	696.92	1.87
1851年	434.39	697.00	1.60

数据来源:《清世祖实录》《清世宗实录》《大清会典》
《户部则例》

除了田赋,盐课也征收困难。清政府实行“纲盐”制度,盐商通过向官方缴纳钱财可以获得世代垄断销售的资格。该制度本身就是通过寻租行为产生的,盐商为了获得特权,必然向官员行贿,各级官府也会层层勒索。“纲盐”带来的利润被剥削殆尽,私盐开始泛滥,致使许多盐商破产,本不多的国家盐课收入也多半被官员私肥。再加上盐课重点区域(即两淮的部分地方)常常是清朝与太平天国争斗的战场,使得清政府的盐课征收能力不断削弱。

(2) 财政支出增加

乾隆年间的“四处征战、游历江南”和嘉庆年间的“镇压起义”使清政府的财政支出不断扩大,经雍正整顿后的财政再次出现亏空状况。到道光年间,形成了“收入有减无增,支出有增无减”的局面。洋务运动前,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更使清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

两次鸦片战争给清朝财政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为例,清政府财政支出及损失分为三个方面:战争军费支出、赔款和英军掠夺的钱财。军费支出来源于财政经费、捐输钱财和摊廉,其中,上报户部的前期财政经费拨款就是“一千数百万两”,还不包括战争后期追报的款项;战争赔款总计1200万两,若四年内不能偿清,逾期每年支付5%利息;英军掠夺的钱财有800多万两(周育民,2000)。而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仅赔偿英军军费和英商损失就是800万两(周至初,2002)。

为了保证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需,道光三十年(1850年)到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对湖北、湖南、江西、贵州、广西的额外拨款就高达1800万两;至咸丰三年(1853年),已出现下月兵饷无着落的情形。由此可见,巨大的战争花费也是造成清政府财政摇摇欲坠的根本原因之一。

一方面,清政府两大最主要税源——田赋和盐课收入锐减,财政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内外战争使清政府财政支出大量增加;结果必然是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为了挽救清王朝,清政府开始开捐例、加田赋,增加税收,以缓解财政压力。在洋务运动开始前,咸丰三年(1853年)开征了新税种——厘金;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外贸易剧增,海关关税收入增加,成为支撑清政府财政的主要税收之一。但新的税源并没有改变清政府财政“收不抵付”的情况,危机状况不断加剧(参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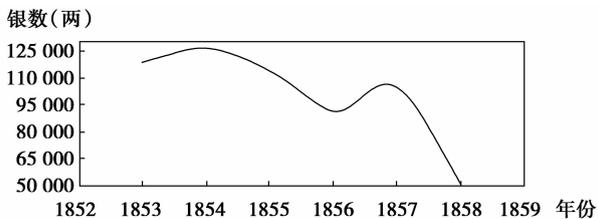


图1 1853—1858年清朝户部银库结存实银数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户部左侍郎卓保同治四年三月十三日奏折清单,转引自彭泽益《咸丰朝银库收支分析》。

2.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财政制度的变化

洋务运动前清政府的财政管理具有高度的中央专制集权特点。清代户部是管理全国财政的行政机关,是财政管理的中心枢纽,通过各省直接隶属于户部的布政使一职,严密掌控地方财政,确保满族的财政利益。虽然具体税收由地方政府负责征收,但中央严格制定税目、税率、税额,并根据田赋收入的多少来对地方官员进行奖惩;而地方开支则需要严格上报户部审核,通过解款协拨制度来支配和控制各省的财政收支。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的财政集权制度逐渐发生了变化。地方兴办洋务和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政府官方军队不堪一击的现实让统治者不得不更多放权于地方;户部的财政危机也使中央不得不放任地方自筹款项,准许地方任意加捐加税,地方财权愈益加重。地方自筹所需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中央财政负担和调度的压力,但也使地方的财政自主权不断加大,地方的财政日趋独立,地方常以各种名义欠解、截留应上缴的款项。到光绪年间,地方割据之势已成,财政上的中央集权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孙刚等,1984),这种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的瓦解,使得户部再也不能有效地掌握全国财政大权,中央财政收入日趋恶化。

3. 洋务运动对清政府财政收支的影响

(1) 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

清政府在经过太平天国运动的打击和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洋务运动的前期就提出了“自强”的口号,创办军事工业,建立新式海军。近代的军事工业开始于1865年设立的江南制造局,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总共创办了二十一家。据统计,这期间清政府对军事工业的投资大约为五千万至五千五百万两(张国辉,1979)。

清政府所建的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除了广东水师经费由广东省自筹、福建水师经费由船政局供给外,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经费来源于中央拨款,整个洋务运动期间,南、北洋水师的购船费用就达一千两百多万两(林庆元,1999)。

到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强调兴办民用企业、投资洋务教育。民用企业经营方式为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三种方式,以官办企业为主,分布在航运、铁路、电讯、金属矿、煤矿、冶金、纺织等部门。据统计,甲午战争以前,清朝政府对民用企业的投资大约为三千四百万两(孙毓棠,1957)。但这些民用企业并未带来财政收入的增长,如周伯棣先生所说,民用企业对政府财政来说“不一定是收入,基本上是支出。”(周伯棣,1981)洋务教育投资主要是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支出。因资料残缺,据估算,新式学堂所耗经费大约为一百三十多万两,洋务留学教育经费为一百四十多万两(夏东元,1996年)。

(2) 开始大举公债

洋务运动的兴起,也给清末的财政带来了新事物、新概念。外国银行越来越多,中国自己的银行也诞生了(在洋务运动地方势力代表人物左宗棠的参与下,中国第一家中西合股的乾泰银行成立)。银行的建立也为政府举债提供了条件。面对财政支出不断增长的压力,为了兴办洋务,清政府开始大量借款。从1853年到1893年,短短的40年间,清政府借款达四千六百多万两,外债达到了政府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从19世纪80年代起,清政府支付的债务利息占财政支出的3%到6%(徐义生,1962年)。

(3) 财政收支结构变化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也发生了变化。清前期的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其中尤以地丁占重要地位,财政支出以军事费、皇室费及官俸为主,体现出封建的农业经济的特征。洋务运动后,清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均发生了重要变化。在财政收入方面,增辟的新税——关税、厘金已经逐渐成为主要收入来源,其中厘金成为清末岁入之大宗。在支出方面,原有的皇室费用虽也有增加,但已不再是主要开销,军事费、洋务费和息债成了新的三项主要支出。

三、明治维新前后日本的财政体制和财政收支状况

1. 明治维新前日本的财政收支状况

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五条誓文》为其标志。在明治维新前,日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松动,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但是,由于德川幕府的落后统治,制度的弊端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问题也诱发了其财政危机。

(1) 财政收入压力大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实行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除德川幕府是最大的封建领主外,其余土地分封给全国260多个“大名”作为其领地,也就是相当于古代中国的“诸侯国”。当时日本80%的人口为农民,农民没有土地,被束缚在土地上,被迫缴纳贡租。除了占收成60%到80%的实物地租外,还有几十种苛捐杂税。由于生产技术并没有改进,在农业人口增加的同时,粮食产量却未同比例增加。随着土地兼并和封建主税负的转嫁,农民承担了大部分的税负。广大农民备受地租、赋税、高利贷的剥削,连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被迫大规模起义,导致日本政府最主要收入来源——租税、地税的课税对象锐减,财政收入压力巨大。

(2) 财政支出需求大

从1785年到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史料中明确记载的农民起义有1009次,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镇压农民起义。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封建领主继续向农民增加租税,致使破产农民越来越多,起义规模越来越大,形成了“起义——加税——再起义”的恶性循环怪圈。

外部环境的变化也造成了日本财政支出的大量增长。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国家已经把触角伸向了日本。从1764年到1854年的90年间,西方国家为了迫使日本开国通商,成为自己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材料产地,对日本进行扩张运动达52次(信夫清三郎,1964)。在明治维新前的15年里,西方国家对日本发动了两次侵略战争,强迫日本签订了25个不平等条约。日本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应对外部压力,进一步深化了其财政危机。

此外,日本财政还需支付大量的俸禄给各级政府官员。“废藩置县”后,武士利益集团的上层仍然坐食俸禄,日本每年的俸禄支出高达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

2. 明治维新中日本政府财政制度的变化

与洋务运动中的清政府正好相反,明治政府在推翻了幕府政权之后,以循序渐进的方法逐步收回了掌握在诸藩手中的财政税收权力,权力的集中使得日本政府对国家的调控能力增强。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废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根据土地实际支配权确定土地所有权,使土地从法律形式上归农民所有;允许农民自由买卖土地、耕种自由、迁居自由;改实物地租为货币地租,按“一地一主”的原则,按地价的3%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税率不因年景变化而改变,地方附加税不得超过地税的三分之一。并实施了包括征收御用金、设立会计基金、废止银目、发行太政官札在内的一系列财政政策。

3. 明治维新对日本政府财政收支的影响

(1) 俸禄制度改革减少了财政支出

明治维新前,武士集团的上层——华族、士族的俸禄给日本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包袱。由于华族、士族在社会上有不低的地位,掌握着一部分的权力,为了防止过激的改革措施带来摩擦甚至暴动事件,明治政府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温和改良政策。通过“赎买”政策,将北海道的土地以优惠的价格出售给华族、士族;优先录用华族、士族充任官吏、警察和教师;华族、士族贷款享受低息或者无息优惠;并通过逐渐减少俸禄、最后一次发给“金禄公债”的方式改革俸禄制度(吕万和,1984)。

(2) 地税改革增加了财政收入

1873年,明治政府颁布了《地税改革条例》。地税改革从法律上确认了土地私有制,解除了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下农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降低了税收成本,疏通了征税渠道,使明治政府获得了大量、稳定的财政收入。

(3) 扶持民间资本,开拓新税源

明治政府通过“补助金”等方式大力扶持民间资本,并将一部分官办企业出售给民间资本家,既减轻了财政负担,又为民间资本的蓬勃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新兴部门又逐渐成为明治政府的重要税收来源。1895—1899年,工商税、消费税、所得税总计已占到日本总税收的35%左右,比改革初期提高了大约20个百分点(见表2)。

表2 1875—1899年日本税制结构变化/%

五年平均	地税比重	工商税比重	消费税比重	所得税比重	船舶税比重	其他
1875—1879	80.5	3.1	7.9	0	4.3	4.2
1880—1884	65.6	4.4	21.8	0	4.4	3.8
1885—1889	69.4	3.8	20.2	0.7	5.2	1.4
1890—1894	74.3	2.7	17.2	1.1	4.4	0.3
1895—1899	58.1	5.5	27.2	1.9	7.2	0.1

数据来源:伊文成著《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87页。

四、洋务运动失败与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与启示

在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前,中、日两国经济上都出现了财政亏空、征税困难、税制结构落后等情况。但这两场几乎同时代所发生的社会变革在这两个一衣带水的邻国却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兴办新式军事工业、民用工业、洋务教育,给财政带来了巨大的支出压力;在税制已不能满足财政收入要求的情况下,清政府大举借债,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进一步恶化了财政危机。而日本的明治维新,通过俸禄制度改革减少了财政支出,通过地税改革增加了财政收入,通过扶持民间资本开拓了新税源,使其财政状况发生根本好转,政府已能大体上满足国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进而推动日本向近代化转型。

1.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生产不同财政结果的原因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使两国财政状况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社会经济背景来看:改革前两国的封建专制程度不同。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经过两千年的不断完善、修复,到清政府执政时已到了顶峰,地方的政治、经济都牢牢掌握在中央政府,或者说君主一人手中。而日本幕府权力有限,不能完全控制地方,地方领主拥有一定的经济、行政,甚至是军事权力,这为废除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有利条件。改革前两国的经济结构不同。明朝中后期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随着清兵入关而烟消云散,洋务运动前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仍然处于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受闭关锁国限制和封建势力压制,小农经济思想根深蒂固。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环

境相对宽松。

从改革的指导思想和领导力量来看: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洋务派官僚及知识分子仍在维护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认为“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是正道,只学西方先进技术;而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是“和魂洋才”,强调制度创新与体制改革,接受西方文化,要求进行政治、文化、经济、军事全方位的变革。洋务运动的领导力量是洋务派,在中央以奕訢为代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虽拥有一定的地方势力,但并未掌握统治阶级最高权力,也未获得最高统治者全力支持,需要面对守旧派强大的阻力;而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下级武士维新派,拥有政治远见与改革才干,政治骨干与经济翘楚都出自武士世家,他们与封建制度联系越来越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越来越多,是新兴的革新力量。

从政治体制改革来看:洋务运动一开始就只不过是一部分开明的官僚集团代表在不改变现行封建生产关系的前提下谋求国家近代化的改良运动,在政治体制方面并未进行改革,只是根据外交和洋务需要做出了一些适应西方的调整。比如,成立总理衙门、设立同文馆等。在政治体制并未改革的情况下,财政体制也只能仍然是封建制度下的管理方式,只是把中央政府的财权下移。而日本的明治维新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全面西化与近代化改革运动,其改革是全方位的,进行了相对彻底的政治体制改革:废藩置县,加强中央集权;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取消武士特权;逐步废除封建俸禄制度。明治政府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步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从货币金融体系来看^①：晚清政府由于对近代西方国家的货币金融制度缺乏足够的认知与了解，漠视金融体系的建设，在对外贸易中输入了大量白银，而且为了解决财政困难而大量自铸银币流通，阻碍了信用货币体制和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而日本在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中目光长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公共财政和金融制度的改革，清理了幕府时代留下的混乱货币体制，并建立起一套适应当时经济发展的金本位信用货币体系，同时通过学习外国的经验建立了现代银行体系。金融改革的成功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与成型，这一体系也对明治维新的成功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从财政政策本身来看：太平天国运动直接导致了清政府在权力分配上的“变局”，开启了晚清财政权力下放的过程。权力的下放使得清朝政府对国家的调控能力被直接削弱，而财力的不足又使得清朝在近代化进程中难有作为。洋务运动中，清政府虽然也兴办军事企业、民用企业、投资教育，但对洋务运动的投资占同时期的财政支出的比重较小。明治时期的日本则恰好相反，明治政府在推翻了幕府政权之后逐步收回了掌握在诸藩手中的财政税收权力，并在财政支出方面拿出大量资金对官营企业进行直接资助，为日本走向近代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提供了足够的资金保障与支持（黄灏，2012）。同时，俸禄制度的改革，不仅减少了财政刚性支出，还促使政权从旧有的士族上层少数利益集团向代表大多数人的下层转移；地税改革在增加财政收入的同时促进了日本农业发展和原始资本积累，而土地私有化则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扶持民间资本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日本逐步确立。可见，日本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功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

2. 洋务运动失败与明治维新成功的启示

洋务运动带来了财政赤字，明治维新带来了财政盈余，不同的财政结果是由两国政府是否从根本上改革了财政体制所直接决定的，而不是改革财政体制又是由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决定的；再进一步讲，是否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又是由两国在改革前政治、经济基础的差异以及两国改革的指导思想

和领导力量的差异决定的。在政治体制改革并未触动的情况下，洋务运动最终并没有使清政府实现富国强兵，走上近代化的发展之路，其所引发的财政危机反而使清朝统治者走上了一条消亡的不归之路。而日本的土地私有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在全面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功使日本政府财政状况发生根本性好转，进而有力推动了日本近代化进程，使日本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财政体制从来不是孤立的，一国的全部经济、政治活动都会在财政体制中得到反映，若经济、政治出现问题，必然会带来财政问题。洋务运动所引发的财政危机与明治维新带来的财政改革成功不得不引人深思。管中窥豹，财政状况的变化可以反映财政体制改革的实效，也是衡量社会经济转型得失的一把标尺。以史明智，“向谁收税、怎么收税、收多少税、怎么用税”等一系列基本的财政问题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民主、政治、法治的大问题。处于社会转型浪潮中的我们，应该从历史厚重的脚步声中得到某种警示，从而为当前和今后的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与参考。

参考文献：

- 车维汉. 2008. 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明治维新的另一种诠释[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3):72-79.
- 陈峰. 2004. 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J]. 史学月刊(1): 113-121.
- 陈锋. 2004. 20世纪的晚晴财政史研究[J]. 近代史研究(1): 245-281.
- 陈秀尾. 1994. 论晚清财政对洋务运动的影响[J]. 中国经济史研究(1):67-78.
- 抚志明. 1988. 试论洋务运动对清末财政的影响[J]. 贵州社会科学(4):47-50.
- 黄灏. 2012. 财政危机的处理措施对中日两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J]. 历史教学问题(4):103-107.
- 贾小叶. 2001. “中体西用”论不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5):140-145.
- 梁大伟, 黄定天. 2011. 同途殊归: 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再审视[J]. 东北师大学报(4):258-259.
- 林庆元. 1999. 福建船政局史稿[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15.

^① 货币与金融体系的建立对一国经济的发展与壮大至关重要。纵观世界历史，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强国无不在经济起飞之前经历了某种程度上的金融改革，而健全的货币制度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基础与核心。

刘义程. 2006. 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之路——以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为中心[J]. 井冈山学院学报(5):55-59.

吕万和. 1984. 简明日本近代史[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47.

穆良平. 2003. 日本地税改革探讨[J]. 社会科学研究(6):128-132.

孙毓棠. 1957.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M]. 北京:科学出版社:886-887.

孙栩栩,李谓清. 1984. 中国财政史[M]. 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249-252.

夏东元. 1996. 洋务运动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463.

萧一山. 2006. 清代通史[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99.

信夫清三郎. 1964. 日本外交史[M]. 东京:东京每日新闻社.

徐义生. 1962. 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M]. 北京:中华书局:6-10.

张国辉. 1979.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68-169.

周伯棣. 1981. 中国财政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493.

周育民. 2000. 晚清的财政与社会变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78.

周至初. 2002. 晚晴财政经济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30.

Comparative Study on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Meiji Reform from the View of Public Finance

LIU Ji-yong, ZHANG Nan

(School of Finance and Tax, Zhongn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 and Law, Wuhan 430073, China)

Abstract: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in China befor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and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in Japan before Meiji Reform were similar and confronted financial crisis. Becaus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ifference before the reform of the two countries, and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 in reform guiding ideas and leading capacity of the two countrie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of the Qing Dynasty did not conduct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its financial system was still the management style under feudal system, the Qing Dynasty only decentralized its financial right, which finally did not bring about financial situation change but intensified financial crisis, however, Meiji Reform of Japanese Government is overall, conducted relatively thorough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reformed salary system to reduce financial expenditure, reformed land tax to increase financial revenue, supported civil capital to exploit new tax sources and finally solved financial crisis to have set up new financial system conducive to capitalist production mode development.

Key words: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Meiji Reform; modernization; social reform;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financial system reform; financial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ituation; financial crisis; civil capital; private enterprise

CLC number: F811.6; F064.2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3)02-0095-07

(编辑:南北)